

DOI: 10. 14137/j. cnki. issn1003 - 5281. 2018. 04. 024

“应试主义”的成因与高考改革的方向

周序

(上饶师范学院, 江西 上饶 334001;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应试教育”含有合理的、无需苛责的成分,真正值得批判、需要改革的应该是“应试主义”。“应试主义”源于学生功利但正当的个人诉求,它早在科举时期就已经存在,在今日的基础教育中得到进一步的延续。“应试教育”远非一个教育问题,而是深受异化的公平观影响的一个社会问题。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解决“应试主义”问题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基础教育的出路不在于打倒“应试教育”,而在于努力避免“应试主义”的出现。这需要我们顺应学生对应试的需求,引导学校和学生用符合教育规律的方式来应试,而这可以通过高考命题技术的革新来实现。

[关键词]“应试主义”;高考公平;人文主义;命题技术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5281(2018)04 - 0159 - 08

近几年,新一轮的高考改革如火如荼。无论是北大推行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还是浙江、上海等地率先试行的“不分文理高考”,亦或是北京市实行的“语文加分英语降分”,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新一轮的高考改革虽然方案各异,但都不约而同地将焦点集中在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上。例如“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希望选拔出“偏才”和“怪才”,达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目的;而“不分文理高考”,用意在于减少学科之间的隔阂,以逐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综合能力;至于“语文加分英语降分”,按照《北京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法,是为了“适应高中新课程改革的需要,积极引导基础教育坚持育人为本,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推进素质教育”。总的来说,高考改革的新方案意在发挥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将基础教育从“应试教育”的

路子上拉回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

然而,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呼声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诸如保送生制度、“3+X”、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等指向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改革措施也轮番登场。但多年来“应试教育”依然打而不倒,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高考状元被持续热炒,湖北高三“吊瓶班”横空出世,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等“高考工厂”成为热搜,等等。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忧。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措施究竟在打倒“应试教育”方面有多大作为?

一、“应试教育”和“应试主义”

“应试教育”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但这一概念的内涵却非常混乱。诸如,“应试”“片面

[收稿日期]2018-03-20

[作者简介]周序,男,上饶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

应试”“应试教育”等提法经常被混同在一起。“应试”是否一定就“片面”？“应试教育”是不是十恶不赦？一个从不应试、完全不为考试做任何复习准备的学生，我们到底是该认为他的身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精神，还是去指责他的学习态度不端正？对于此类种种问题，我们一直都没有辨析清楚，因而，对“应试教育”的批判往往流于简单化、情绪化。

“应试教育”通常被理解成“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考什么教什么，不考就不教”，这样一种理解将矛头指向了考试。然而，我们很难找到没有考试的教育，也无法想象有考试却不为考试进行专门准备的情形。其实，人们反感“应试教育”，绝不是因为教育当中有考试或者它针对考试，而是因为它采用了很多违反教育规律的做法，比如满堂灌输、题海战术、死记硬背，并且贯穿于整个基础教育的始终，对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只不过，我们大多认为这一切是因为考试的存在而导致的，因此称之为“应试教育”并赋予其贬义的含义。

这样一种机械化的、大工业生产般的教育在临近高考的那几个月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成为常态，大大小小的模拟考试、摸底测验更是家常便饭。如果有哪个老师在这个时候不带着学生进行有计划的复习备考，而是经常搞些“素质拓展”或者“实践技能训练”，反而会成为怪事，恐怕家长和学生也都不会答应。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谁都讨厌应试，但偏偏在“应试”最极端、最让学生感到痛苦的这一“关键时期”，却还要依赖应试，不搞应试的老师一定是“不务正业”；不跟着老师复习备考的学生则肯定是“问题学生”等等。显而易见，这一阶段的教育虽然也在让学生“片面应试”，但因为正好处在“考前复习”“冲刺准备”的时间节点上，因此显得无可厚非，甚至还能得到人们的宽容和接受。可见，即便是高考前夕这种目的最片面、最令人感到紧张的“应试教育”，仍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空间。这样我们就能够想到，“应试教育”不应该是一个有百弊而无一利的现象，至少作为考试前夕采取的一种短期的、有针对性的学习行为，它的存在是具有客观合理性的。

考试的功能之一在于评价，而评价是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当今社会，但凡接受教育的人，都必然会经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考试，也就不可避

免地会产生应试的主观需求。当评价结果被赋予选拔功能时，这种主观需求就会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试”应该是一个中性词，即便它往往表现出“片面”的特征，但仍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需求。不过，批评意见并非无中生有。一方面，片面应试的现象几乎成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核心工作，从考前的“短期冲刺”变成了贯穿整个基础教育主线的长期行为，以至于“育人”的目的被遮蔽；另一方面，考试也不再只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从教育中外化出来，控制了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向，应试成了教育的唯一追求。这种片面的目的往往通过满堂灌输、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等“仅仅对分数有帮助”的措施来实现。这样一类“应试教育”，就时间而言已经不再是一种短期行为，就方法而言显得过于僵化和机械，自然需要进行检讨和改进。为了与属于短期冲刺的那一类“应试教育”相区分，笔者将后一种称为“应试主义”。在中文语境中，“主义”二字有时候含有“过犹不及”的意思，“正如‘平均主义’之于‘平均’，‘形式主义’之于‘形式’，‘个人主义’之于‘个人’，‘应试主义’亦是如此”^[1]。如果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概念区分，就可以发现，“应试教育”至少包含了中性和贬义两种类型，其中短期的复习和冲刺行为属于“应试教育”中的正常现象，不可避免，也无需苛责；而对我们的基础教育造成危害，值得批判的是“应试教育”中的“应试主义”这一部分。

目前，关于“应试主义”成因的研究大多采取了一种“当代主义”视角。有人从“教学认识论”过分强调知识传授的角度来探究“应试主义”的成因；有人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无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应试主义”的根源；还有人指责多数中小学教师的教学专业化程度不足是造成“应试主义”的罪魁祸首，等等。这样一些对“应试主义”成因的研究都明显是从当前基础教育的现实问题出发的。一位专门从事高考研究的学者说得很明确，“应试主义”是“在当代被无节制的考试竞争所‘异化’的教育”^{[2] (P. 250)}。但史学方面的研究告诉我们，“应试主义”并不是一个“当代问题”，早在科举时期，类似现象就已经普遍存在了。从唐朝开始，由于诗赋在科举考试中日益受到重视，而贴经则遭到冷遇，导致学生们长期“莫修经艺，先圣之道，湮郁不传”^{[3] (P. 106)}。到了清朝，更是“士子读书……不根

抵讲求……圣贤精义全无发明……经济实学,乃向来士子多不留心”^{[4] (PP. 178 ~ 179)}。除了学习内容仅仅针对考试之外,考生们在学习方式上也往往采取“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效”^{[5] (P. 3360)}的做法,有人甚至还揣摩出了“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6] (P. 3820)}之类的命题规律,整理出了“十八房稿”等应试书籍。如果说科考前夕的“讽诵摹效”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先圣之道,湮郁不传”“经济实学,乃向来士子多不留心”则显然不会是考前短期的应试冲刺可以解释的。可以说,这样的“针对性学习行为”贯穿在绝大多数考生的“十年寒窗苦读”当中,也贯穿了整个科举考试的历史。上述文献记录还表明,科举时期教和学的方式都非常的机械和僵化。争相模仿中举之文,和今天答题模板、范文广受欢迎颇为神似;不遗余力地揣摩命题规律,和我们今天研究考纲、题型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至于“十八房稿”之类的应试书籍,则可以看作是今天各种参考书籍、模拟试卷的鼻祖。可以说,科举时期的“应试教育”并没有停留在一个正常的、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是属于典型的“应试主义”了。其严重程度与今日相比也不遑多让。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导致封建社会多数人读书的目的不过是“以取科名而已”^{[7] (P. 559)}。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莫修经艺”“率记陈言”、揣摩命题规律等行为自然产生,并迅速普遍化。即便我们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评说考生们的这种想法非常功利,但却无法否认这一想法从古至今都非常普遍地存在着,甚至,我们无法否认这一功利性的想法其实具有相当的正当性。在目的正当的时候,学校和考生便都不那么在意教与学的方式和手段是否符合教育规律了。为了顺应考生的需求,学校教育中的“应试主义”也就随之诞生了。

二、异化的公平观是造成“应试主义”的社会大环境

既然“应试主义”并非当今社会所独有,那么对“应试主义”的成因分析就不能简单地采取“当代主义”的视角,而是需要探寻其背后更为深刻的社会性因素。为什么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应试主义”,而在美国的基础教育中“应试主义”的现象却没有这么突出?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

和传统不同他国,还是因为不同的教育现象原本就根植于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当中?

我们通常都把“应试主义”当成是一个教育问题,但广大学生致力于应试背后的动力往往不在于教育,而在于“跳农门”“大翻身”,成为天之骄子,实现社会身份的转变。我们对这一点或许早有认识,但遗憾的是并未深究。其实可以说,无论是科举、高考还是“应试主义”,都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说是“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8]。因此,如果仅仅从教育内部对“应试主义”进行研究,无疑难以得出科学合理的认识。我们必须将“应试主义”放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去思考我们为什么总是“不得不”以一种僵化的片面追求分数的方式来应试?

科考生员追求金榜题名,以及今日考生渴望升入大学,可以说都是正当的诉求。高考本质上是一次选拔性考试,由于这一选拔关系到学生的人生命运和前途,被认为具有“高利害性”^[9],因而选拔过程是否公平就显得非常重要。考试和推荐自古就是两种最主要的人才选拔方式。表面上看,推荐能够比考试更加全面地衡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但从古至今,推荐制度始终没有在人才选拔方面体现出积极的效果。朱元璋对这两种人才选拔方式的态度转变就是最好的证明。朱元璋最初对科举取士的方式不太满意,甚至一度“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10] (P. 463)},但后来他发现,“察举贤才”的效果比科举取士还要糟糕,“有司各举才能……往往以庸才充贡……所举者多名实不称,徒应故事而已”^{[11] (PP. 2122 ~ 2123)}。直到今天,推荐制度带来的拉关系、走后门现象依然是屡禁不绝。保送生制度被形容为“送官不送民”^[12],还有人抨击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信校长不如信考分”^[13],可见推荐制度在今天面临的反对声音也比较大。

推荐制度之所以频频招来反对之声,就是因为它无法避免“关系”“人情”的影响。我国既是一个人情社会,又是一个关系社会。无论是一个人手中的权力,还是和他人的交情,亦或是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着强大的运作空间。这样一种社会文化传统使“关系”“人情”对推荐的结果有着很强的影响,从而使人才选拔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中进行。当然,即便采取考试制度,“关系”“人情”的影响也不能完全消除,但考试制度相比于推荐制度来说,其优势在于它将文化资本推到了第一位,实行的是

“一切以程文为去留”^{[14] [P. 69]}。考生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最后都必须转化为文化资本,即以考试成绩作为是否录取的依据。所以说,考试制度之所以战胜了推荐制度在当今社会持续沿用,是因为它使“关系”“人情”对人才选拔的干扰降到了最低。它不是最好的人才选拔制度,但却是到目前为止“最不坏”的制度,“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因为不依据考试成绩而决定谁有权利接受高等教育的其他选拔制度缺陷更多”^[15],因而最为贴近民众对“公平”的诉求。可以说,通过考试进行人才选拔,是历史在维护公平的前提下做出的一种勉为其难的选择。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明朝的王世贞在评价科举考试的时候,会称其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公平,“我朝二百余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16] [P. 1604]}。

那么,高考制度的公平性究竟体现在哪里?2009年《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64.4%的人认为统一高考是能够保证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公平公正的制度^[17];同年在《中国青年报》的另一项调查中,有58.7%的人认为“高考加分政策严重破坏了教育公平”,76.9%的人建议“取消一切可能滋生腐败的高考政策”,这份调查报告由此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不包含任何加分在内的“裸考”已成民心所向。^[18]上述数据反映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人们心目中的高考公平,其实就是取消各种容易滋生腐败的推荐、加分制度,完全凭分数高低来竞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关键在于“平等”二字。“平等表达了相同性概念……两个或更多的人或客体,只要在某些或所有方面处于同样的、相同的或相似的状态,那就可以说他们是平等的。”^{[19] [P. 381]}可见,“平等”是一个“事实判断”,它和带有“价值判断”内涵的“公平”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公平”比“平等”更抽象,更具道德意味、伦理性和历史性。^{[20] [PP. 4~5]}比如说,让教育条件落后地区的考生和大城市的考生同台竞争,用同一个分数线“平等”地进行衡量,那就有违道德和伦理,相当于是用“平等”扼杀了“公平”。从罗尔斯的“结果公平”原则出发,对前者进行一定程度的照顾性加分,才具备道德意味,才是“公平”的。

然而有意思的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对这种蕴含着道德意蕴的公平并不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处在社会底层、原本最需要得到道德层面照顾的人,偏

偏对各种加分政策最为反感。这是因为在人情社会、关系社会当中,社会诚信的缺失往往使人们对公权力产生一种不信任感,他们认为诸如特长生加分、思想品德先进事迹个人加分、三好学生加分等容易滋生腐败,能够得到加分的未必就是那些真正有资格的人。人们的这一担心并非空穴来风。2009年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多为领导干部子女,这一事件经媒体曝光后,有超过七成的民众将其看作是“2009年最损害教育公平事件”^[18]。因此,为了避免这种“以道德关怀为名”的不公平现象出现,人们宁愿牺牲掉公平中的道德性,可以不要“结果公平”,只要能尽可能地排除金钱、人情、关系的干扰就好。这样,旨在追求“平等”的分数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公平的代言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就自然成为高考公平的象征。

因此,虽然公平和平等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在社会诚信缺失的大环境中,向往平等,甚至甘愿以平等来代替公平的心态是如此之普遍。正是这种心态,成为人们看重分数、竞相追逐分数的文化观念基础。

当我们用“平等”来彰显“公平”的时候,道德意蕴也好,伦理关怀也罢,便都随之丧失。这个时候公平就已经被异化了。在这种异化的公平观的影响下,高考分数被捧上神坛,它既是高校录取的依据,也是学生能力的象征,还是社会公平的化身。这样一来,教师和学生片面追求分数就显得理所当然、有理有据;哪怕是为了追求分数而无所不用其极,也可以说是情有可原、无可厚非。当分数成为教育的追求时,人们便不会再顾及手段是否符合教育规律,而只会考虑其效果。有一线教师总结说,“满堂灌”是“专门针对考试内容进行训练而最大化高考效益的教学行为,是一种有效的高考教学模式”^{[21] [P. 72]};有学生评价“题海战术”说,“效果非常明显……对拿到高分确实有帮助”^[22];有学者研究发现,“应试教育的成绩效应显然要大于素质教育”^[23]等等。当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都纷纷显示这些违反教育规律的、机械僵化的教学方式最有益于学生成绩的提高时,“应试主义”的出现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同时也让人无可奈何的事情了。

归根结底,“应试主义”实际上是我们追求公平但公平却在追求的过程中被异化的结果,这一异化之所以产生,其根源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讲关系、重人情的社会文化。所以,“应试主义”并不

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它其实应该是“表现在教育中的一个问题”。它深受讲关系、重人情的传统文化导致的社会诚信缺失的影响,而成为“应试主义”直接助推手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是人们为了弥补这一社会诚信缺失而采取的一个无可奈何的方案而已。

三、人文主义不是改革“应试主义”的良方

由于“应试主义”的突出特点是操作机械、僵化,将分数作为直接和终极的追求,因此有人提出,可以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当中去探索改革“应试主义”的出路。“改变为考试、为分数、为升学的应试教育,需要重新认识人文主义的教育价值,奠定新一轮教育改革的价值基础。”^[24]倘若人文主义思想能够在基础教育当中普及的话,那么诸如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等常见的应试措施或许就难觅容身之地了。新一轮的高考改革蕴含着明显的人文主义精神,无论是自主招生考试还是“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都是为了“倒逼”基础教育不要一味重视分数,要为具有独特才能或一技之长的考生打开另一扇窗。“语文加分英语降分”,则是为了“让以国学为主要内容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落实在教材里、课堂上、考试中。更多国学内容落实在教材里、课堂上、考试中时,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日”^[25];至于“不分文理高考”,更是为了杜绝学生们在“片面应试”的驱使下被动地偏科发展的情况,希望让所有学生都能既掌握科学知识,又具备人文素养。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看起来无比美好,但其主张却显得模糊而空洞。例如,“素质教育”经常被学者们当作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一次具体尝试。人们用“充满生机的课堂”“感受生命的成长”“体现育人的本质”等积极的词汇来形容“素质教育”的人文精神,但这些辞藻虽然带给人美好的向往,却显得不好琢磨、难以把握,缺乏可供模仿的范本和可供借鉴的实施方案。即便是关于“素质教育”的具体内涵,也是“一千个研究者心中有一千种‘素质教育’”。陈建华认为,“素质教育”是为学生的成长发展奠定基础的“基础教育”^[26];而李奇勇则认为这个基础不能奠定得太多了,要讲究“适度”,因此“素质教育”就是“适度教育”^[27];曾水兵把国民奴性性格和自私心理的改造看成是“素质教育”

的核心^[28];而刘道玉则认为“素质教育”的核心并不在于“改造”,而应该是“培养创造力”^[29],诸如此类。在理论界关于“究竟什么是‘素质教育’”的观点都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一线教师在实践中感到困惑、彷徨乃至无所适从,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文主义教育面临的困境还不止于此。人文主义教育“关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教学效果,不是知识点和‘提分’,而是学会学习和合作、阅读习惯的养成、知识系统的构建、反思和批判能力等等”^[24]。人文主义教育的这一特点与学生们的现实需求存在明显冲突。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不但身处“教育场域”之内,同时也置身于“考选世界”当中。^[30]升学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导致学生们最关心、最在乎的就是“短平快”的教学效果和“提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可改变的前提下,号召大家不去关注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无疑太过理想化。所以说,不正视应试这一客观存在的需求,仅仅是从理念上号召师生双方应该更多地关注合作学习、习惯养成、批判能力等,以期更多地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精神,这一思路就显得一厢情愿了,难以解决“应试主义”这一社会性难题。

但人文主义教育在美国似乎取得了成功。美国政府用低控制、低竞争的《每个学生成功法案》取代强调学业成就和绩效评价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新法案体现了“对学生差异性的尊重、对当前学校教育本质的理解和对学校社会职能广阔而深刻的认识”^[31]等人文精神。此外,格罗夫尔中学降低数学教学要求,以及哈佛大学提出改革入学评价标准,强调课外活动和帮助他人等,也都是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体现。正是因为人文主义在美国的成功抬头,让我们对其心向往之。但正如前文所说,任何教育现象都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在美国社会,关系、人情相对淡薄,社会诚信度较高,人文主义教育所看重的综合素养、道德品质、活动经历等无法用考试分数来体现的内容,可以通过校长推荐信、社会实践证明等纳入到招生选拔过程当中,并且不会招致人们的普遍质疑。

但在社会诚信度还不够高的中国,却很可能出现课外活动弄虚作假,帮助他人的经历依靠钱权交易获得的现象。比如,当年北大推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时候,一些获得了推荐资格的校长把

推荐机会当成“走过场”,在他们看来,用人文、素养等非常规的标准选拔人才,在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非不能也,不敢也”。^[32]文化大环境的不同,导致人文主义教育面临着“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尴尬。因此,试图通过人文主义对基础教育进行改造,从而破解“应试主义”,这条道路是很难走得通的。

四、破解“应试主义”应 加强高考命题技术改革

呼吁打倒“应试教育”而改走人文主义教育路线,明显是将改革的矛头对准了“应试”二字,试图通过对人文主义教育理念的强调,弱化应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但正如前文所说,学生的应试需求源于他们自身的利益诉求,应试背后的目的不仅仅是教育性的,更是社会性的,我们无法否认,更无从禁止。高考辅导班持续火爆、高考状元学习心得成为热门分享,等等,这些现象都说明源自学生个人和家庭利益诉求的应试仍大有市场。因此,任何试图弱化应试的改革思路都注定不可能取得成功。如果说应试无可厚非但“应试主义”则需要努力避免,那么我们要针对的就不是“应试”,而是要针对“主义”二字,要承认应试的合理性并努力将其导入正轨,让学生用一种相对来说更符合教育规律的、合理的方式来应试,避免僵化的、机械的“应试主义”现象的出现。具体地说,我们不是让学生通过满堂灌输、题海战术、死记硬背、套用解题模板之类的方法来应试,而是应该让他们通过切实提高自身综合能力和素质的方式来应试。

新一轮高考改革虽然意在促进基础教育向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方向“转向”,但却未必能够在破解“应试主义”方面有多大作为。高考从“3+2”改为“3+文理小综合”,但基础教育并没有随着我们对综合知识的强调而转向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或者说综合能力,各种简单的、片面的应试措施依然存在。可见,仅仅是考试科目从“分”到“总”,无益于局面的改变。那么,当我们从文理小综合进一步变为“不分文理高考”时,满堂灌输、题海战术、死记硬背之类的应试策略仍很难随之销声匿迹,只不过以前需要死记硬背的是“小综合”,而现在需要死记硬背的是“不分文理”之后的自选科目而已。再者,高考各科分值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调整

过,但“应试主义”并未随着分值的变动而有所改观。可以预想,满堂灌输的现象不会随着语文分值的提高而减少;题海战术也不会因为英语分值的降低而有所减轻。

高考科目组合的调整、分值比例的增减都属于是高考“内容”层面的改革,只是导致学生备考重点、复习范围的变化,却不会带来应试方式的转变。可见,破解“应试主义”的关键并不在于学生应试的内容是什么,而在于学生能否用符合教育规律的方式来应试。原本正常的应试之所以演变为“应试主义”,是因为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等常见方法能够让学生快速地记住那些属于“考点”范围内的知识,并掌握各种答题模板、套路等运用这些知识的应试技巧。这在命题规律可供探寻、命题套路为人熟知的情况下,能够迅速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这种情况在科举时期就已经存在。由于“贴经”“问义”“策问”等科考题目命题套路容易揣摩,皆有旧例可循,因此有的考生平时就将这些内容搜集起来,并编写成诗词歌诀或类似于今日“答题套路”的形式,即所谓的“贴括”“义条”“策学”“策括”等,以方便自己熟背之后应试,以至于出现了“进士举人只务雕刻之工”^[33](P.4263)、“郡县岁贡生率记陈言”^[34](P.131)的现象。可见,“应试主义”泛滥的直接原因并不在于命题对哪些知识赋予多大的分值,而在于命出什么样的题,也就是命题技术、命题质量是否可靠,能否把通过应试技巧来作答的方式排除在外。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对高考命题技术的关注比较多,但近些年来,人们逐渐不怎么讲技术了,似乎谁要再谈技术,谁就显得落伍过时了。在考试评价领域,对技术的忽视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也造成了命题技术严重落后于评价理念的状况。高考题目当中所谓的“能力题”,并不能考查出学生的真实能力,学生们完全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应试技巧来应对^[35],其效果甚至比依靠“能力”来答题更加明显。由于“教师并非毫无主见、任人摆布的教学工具”^[36],因此当教师们发现这些让学生“片面应试”的教学方式虽然不符合教育规律,但对升学这一“最重要的目的”却利大于弊时,他们便不再理会高考改革措施中蕴含的“人文主义”“能力为本”等理念,而是纷纷呼吁“注重应试技巧训练,提升学生解题能力”^[37]、“加强解题能力和技巧的训练”^[38]。一位物理老师表述得非常之具体“以高

考试题为风向标备考……注重物理基本分析方法、常规解题思路和通用方法的训练,加强估算类问题求解方法训练。”^[39]这样一来,针对现成知识结论的满堂灌输、针对应试技巧的题海战术,依然会大行其道。

命题技术得不到研究者的关注,并不代表它在实践领域中发挥的作用不大。以高考作文为例,1999年开始的话题作文改革,应该算得上是命题技术革新其中的一个成功案例。不仅扭转了议论文一统天下的局面,更多地彰显了学生的活力和个性,同时也避免了作文模板导致1998年沦为“父母双亡”年的尴尬境地。^[40]但随着话题作文的写作套路被广泛研究,这一命题方式也逐渐漏洞百出,遭人诟病。于是我们又有了材料作文,有人发现,材料作文在使用之初能够“防止宿构套作……但近几年,诸多问题开始暴露……高中写作教学逐渐由培养学生实际表达能力转变为提高应试技巧……长久以来针对标题作文和话题作文的应试技巧却依然有用武之地,可以挪用在材料作文上……套作、假话空话又卷土而来”^[41]。可见,当一种新的命题技术出现的时候,由于学生们没有准备过相应的应试技巧,往往可以考查出他们的真才实学;但当命题技术难以压制应试技术的时候,“应试主义”的现象就会开始泛滥。

这就给我们破解“应试主义”难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只有命题技术不断更新完善,才可能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做出一个相对真实的考查;只有在应试技巧不管用的情况下,教学重心才可能转移到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上去。命题技术的改革虽然也只是教育本身的改革,无法动摇“应试主义”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但因为它正好处于学生通过教育手段实现社会性目的的节点之上,因而即便不能从根源上彻底消解“应试主义”,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应试主义”的出现。当我们有了过硬的命题技术,编制出了高质量的高考试卷,让学生无法按照“模板”来写作文,无法根据“套路”来做论述,无法用各种应试技术、技巧来获取分数的时候,那么课堂教学当中的满堂灌输自然就失去了意义,课后的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也就没有了效用。虽然学生一样会为应试而努力,但努力的方向不再是依靠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因为这些方式对他们获取高分已经没有重大意义了。教师同样需要顺应学生的应试需求,但不再会过度依赖满

堂灌输、周周清、堂堂清等方式,而是必须转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这个时候,“应试”依然存在,但“主义”却被我们消解了。它不再是一种片面的应试,而是靠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与素质来应试。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理想的教育的样子么?

总之,当我们身处人情社会,受困于拉关系、讲人情、迎送往来的时候,凭分录取就不可避免;而学生想上大学的动机又无可指责,因此对其应试行为也难以进行苛责。这个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让学生的“分数”能够与其“能力”“素质”实现对接,而不是“分数”和“应试技巧”的对接。所以,基础教育的出路不在于批判和否定应试,而是让学生通过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来应试;不是要打倒“应试教育”,而是要使广大考生应试的需求和全面发展的需求能够统一起来,以避免“应试主义”的出现。在这方面,显然不能寄望于“人文主义”的浪漫情怀,而高考命题技术的革新应该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 [1]周序.“应试主义”的“应试规训”及其消解[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
- [2]郑若玲.考试与社会之关系研究——以科举、高考为例[D].厦门:厦门大学,2006.
- [3]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4]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六)[Z].永瑆,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三八〇(影印版)[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 [5]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6]刘昉,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7]司马光.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三)[M].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8.
- [8]谢名春,等.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 [9]陈为峰.大规模高利害考试后效研究——以科举、中美高校招生考试为例[D].厦门:厦门大学,2012.
- [10]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1]明实录(第六册)[Z].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 [12]郑若玲.高考公平的忧思与求索[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2).
- [13]谢洋.校长实名推荐?七成网友反对[N].中国青年报,2009-11-12.
- [14]陆游.老学庵笔记[M].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5]余英.教育公平与社会比较——对“教育越来越不公平”的一个解释[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5).
- [16]王世贞.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7]王聪聪,吴拓宇.为什么 82.2% 的人认为保送生多是“关系生”[N].中国青年报 2009-07-14.
- [18]肖舒楠.公众感受 2009: 调查显示仅 11.2% 受访者称教育公平[N].中国青年报 2009-12-15.
- [19]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 [20]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21]周颖.“县中模式”的特点及成因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9.
- [22]肖云.关于教辅材料依然热销的冷思考[J].家长,2004 (5).
- [23]钱林晓,王一涛.应试教育条件下的学生学习行为模型[J].教育与经济 2006 (1).
- [24]杨东平.重新认识应试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 (2).
- [25]杜丁.高考语文分值或将增至 180 分[N].新京报,2013-10-22.
- [26]陈建华.论基础教育、素质教育与博雅教育的内在关系[J].南京社会科学 2013 (9).
- [27]李奇勇.素质教育就是适度教育[J].中国教育学刊,2015 (6).
- [28]曾水兵.再论国民性改造是当代素质教育的重要内涵[J].教育科学研究 2014 (8).
- [29]刘道玉.论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与实施路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3).
- [30]张行涛.必要的乌托邦: 考选世界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31]谷贤林.破解《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的“成功密码”[J].人民教育 2016 (5).
- [32]汤寒锋.校长推荐上北京大学认真走“过场”[N].重庆晚报 2009-11-22.
- [33]徐松.宋会要辑稿(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34]明实录(第九册)[Z].“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 [35]周序,郑新蓉.高考承载的“异化”压力与可能消解[J].中国教育学刊 2012 (2).
- [36]吴原.教育研究的实践转向与教育创新[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
- [37]高敬智.研究新课程高考理综卷提高生物备考的有效性[J].考试与招生 2012 (1).
- [38]赵玉彩.回归教材,有针对性地查漏补缺——近四年高考生物试卷简析及冲刺复习建议[J].考试与招生,2009 (4).
- [39]胡志巧.2008 年高考理综(全国 1 卷)物理试卷评析[J].考试与招生 2009 (2).
- [40]张行涛.考试的社会学概观[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 (3).
- [41]赵静宇.2015 年高考全国卷作文的两个新变化[J].课程·教材·教法 2015 (11).

(责任编辑 李静丽)

The Cause of Examinationism and the Direction of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Reform

ZHOU Xu

(Shangrao Normal College, Shangrao Jiangxi 334001;
Research Center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Owing to its reasonable elements and undeniable advantages, it is inappropriate to bitterly criticize or even dispose Exam-oriented Education, while in fact what should be blamed or revolutionized is Examinationism. Examinationism, resulting from test-takers' pragmatic but justified needs, dates back to the Imperial Era, and has been greatly developing in the current fundamental education of China. It is by no means an educational problem, but a social one entwined with abnormal and ultra-equality views. Humanism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s of Examinationism. The way out for fundamental education does not lie to deleting exam-oriented education, but try to avoid the Examinationism trends, which requires the respect and wise direction to students' pragmatic needs, and also an educationally reasonable testing methodology followed by schools and students, which can be realized by the revolutions of testing technologies.

[Key words] Examinationism; Equality of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Humanism; Testing Technologies